

就地城镇化建设是否提升了地区外商投资水平?

吴梦雅¹, 郭旭², 关登佳²

(1. 芜湖航空职业学院数字财商系, 安徽 芜湖 24100; 2. 大连海事大学航运经济与管理学院, 辽宁 大连 16000)

摘要: 从县域层面吸引和利用外资是推动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实践要求。理论研究上,从产业结构、营商环境以及财政支出三个方面,阐述了就地城镇化建设对外商投资水平提升的作用机制。经验研究中,以2013—2021年30个省份(因数据缺失,未包含西藏地区和港、澳、台地区)面板数据为样本,通过熵值法构建地城镇化指标。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就地城镇化能够显著地提升地区外商投资水平;相比与经济发展水平高和财政压力小的地区,就地城镇化建设对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财政压力较大地区的外商投资水平具有更显著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 就地城镇化; 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 熵值法

中图分类号: F299.21; F832.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1807(2024)24-0210-07

城镇化对投资需求具有显著的带动效应,当城镇化率进入60%后,每提升1个百分点,将直接带动人均资本存量增加3.5%。随着城镇化率的不断提升,中国城镇资本存量也在快速累积,省际间存在人均资本相对量的差异,多地具有较大的投资空间和潜力^[1]。近年来,随着新型城镇化的不断推进,跨省区人口流动趋缓、近域化流动趋势加强、返乡农民工回流,以大城市群为主要发展路径的城镇化开始向小城镇、县域或地级市的就地城镇化转变。就地城镇化作为新型城镇化的重要补充,能够通过吸引农业转移人口集聚、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以及补齐城市设施短板弱项,有效地释放消费和投资潜力。现如今,随着2023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的下降,2024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扎实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行动方案》,表明中国对吸引外资工作的高度重视,以实际行动增强境外投资者投资中国的决心和信心。因此,研究就地城镇化能否提升外商投资水平,对进一步拓展城镇化的投资空间以及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

理论上,“城镇化”作为农村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的过程,与地区投资呈现相互作用关系。一方面,政府投资推动城镇化建设,城镇化发展过程会面临较大的资金缺口,需要大量可持续的投资予以

保证^[2];另一方面,城镇化能够通过增加住房需求^[3]、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激发投资活力,进而拉动投资发展^[4]。随着城镇化的高质量发展,外商投资作为各地招商引资的重要对象,是地区投资发展水平的重要依据。现有研究认为,就地城镇化建设对外商投资水平的影响既有正向作用,也有负向作用。部分学者认为,城镇化建设能够促进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增加投资和提高劳动生产率,进而提高地区外商投资水平^[5]。并随着城镇化的不断发展,城镇化会通过扩大市场消费空间、改善投资环境和增加投资机会,促进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流入^[6]。另一部分学者认为,城镇化建设会抑制外商投资的进入。林俊岐和朱万闯^[7]指出,过快的城市化会导致忽视城市化“质量”,使得投资环境改善不足,不利于引进外资。在此基础上,潘雅茹和罗良文^[8]认为城镇化水平区域差异会影响中国FDI空间分布,虽然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有利于促进FDI,但是产业城镇化则会抑制FDI。

当前,随着中国城镇化的不断发展,就地城镇化缓解异地城镇化带来的人口拥挤、交通堵塞、住房紧张、环境恶化等“城市病”的作用凸显,能够提高新型城镇化质量^[9]。然而,通过梳理与总结现有相关文献发现:一方面,就地城镇化的研究较少,并

收稿日期: 2024-07-09

基金项目: 新型城镇化建设中辽宁省人口迁移机制与技能溢价效应研究(L22CJY 006)

作者简介: 吴梦雅(1999—),女,安徽滁州人,硕士,助教,研究方向为国际商务;通信作者郭旭(1989—),女,吉林松原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学;关登佳(2003—),女,河南平顶山人,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学。

且多以典型的个案为基础,缺乏就地城镇化的实证相关研究。另一方面,就地城镇化与外商投资之间的理论机制和实证关系相对缺乏。因此,文章通过构建就地城镇化指标,从理论和证实两个角度探究了就地城镇化对外商投资水平的影响,并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以及财政压力等方面对就地城镇化的外商投资影响进行了异质性分析。

1 理论机制

就地城镇化作为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模式之一,能够通过小城镇、县域或地级市的就地转化,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优化投资营商环境以及增加财政支出,提升外商投资水平。

就地城镇化是指农村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的过程,能够通过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促使劳动力从生产率较低的农业向生产率较高的工业流动,进而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地区生产效率,实现地区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10]。此外,劳动力人口向城镇地区集聚,一方面能够为当地企业提供充足的人力资源保障,降低企业的用工成本,提高企业生产的灵活性和生产率;另一方面,劳动力数量与市场规模直接相关,劳动力数量的增加,能够有效的提升消费能力和市场需求,带动投资需求和投资结构转变,促使需求与收入弹性差的行业将资源与要素转移到更高行业,进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地区产业结构是影响外商投资区位选址的重要影响因素。首先,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能够提升市场的吸引力和竞争力,进而吸引更多的外商投资。地区的产业结构越高级,意味着更多的高附加值产业和先进技术,这能够为外商投资提供了更多的商业机会和利润空间,进而有助于吸引更多外商前来投资。此外,产业结构升级有助于降低外商投资的风险。高级化的产业结构意味着更加成熟和稳定的市场环境,减少了市场波动和不确定性对投资的影响;与此同时,在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会带来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这有利于为外商投资提供了更多的收益机会。因此,根据上述分析,提出以下假说。

H1:就地城镇化能够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提升外商投资水平。

以往经验表明,就地城镇化首先为一种投资活动,一个国家或地区为了顺利推行城镇化,会围绕城镇化开展一些政策部署以及投资支持^[3]。政策部署主要包括简化审批流程,提高行政效率以及提供税收减免、土地优惠、财政补贴等优惠政策,投资支

持主要包括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这些措施能够补齐城镇地区设施短板弱项,为外商投资提供良好的营商环境。营商环境是企业最先感知到的环境载体,它代表城市创造力、吸引力和竞争力,是吸引企业投资、便捷企业出入、促进企业持续发展的制度、市场、要素、配套和法治环境等一系列外部条件组成的有机生态系统。良好的营商环境是外商投资的前提和基础,关系到外资企业的投资意愿、经营效果以及长期发展。首先,行政审批流程的简化和行政效率的提升,提高外资企业进入的便利程度,帮助外资企业更快地适应市场环境,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从而有利于外资企业更加专注于经营和发展。其次,税收减免、土地优惠、财政补贴等优惠政策能够减少外资企业的经营成本,提高其盈利能力,增强外资企业进入的吸引力。与此同时,良好的营商环境能够确保各类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平等地位,通过公平竞争激发市场活力,推动外资企业不断提升自身实力和市场竞争力。最后,外资企业在选取投资区位时会通常会考虑政策风险和不确定性因素,良好的营商环境能够保障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降低投资风险,进而增加外资投资的信心。因此,根据上述分析,提出以下假说。

H2:就地城镇化能够通过优化营商环境,提升外商投资水平。

城镇化是一个需要大量资金投入的过程,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设施等都需要国家资金保障。因此,为了保障就地城镇化建设资金需求,国家或地方都会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加对当地的财政支出。而财政支出是地方政府竞争外商投资的重要工具,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增加财政支出或改变财政支出结构等方式吸引外商投资的进入^[11]。一方面,地方政府增加对就地城镇化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的财政支出,能够显著改善投资环境,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提高生产效率。此外,完善的基础设施能够为企业提供便利的物流、通信和能源供应,降低企业的外部风险,进而增强外商直接投资的信心和意愿,促进外资的流入。另一方面,政府为了推动就地城镇化建设的发展,一般会实施税收优惠等策略性财政行为,增加投资的吸引力。地方政府通过财政支出提供税收减免、投资补贴等优惠政策,以降低外商直接投资的成本,提高其盈利能力,进而能够显著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随着城

镇化的不断发展,税收优惠带来的引进外资的竞争力开始下降,当地政府则可以通过调整税收支出的结构,进而增加外商投资的吸引力。合理的财政结构和较高的财政支出效率,能够高效地用于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将提高外商直接投资的长期回报,进而能够持续的增加外资进入,提高地区外商投资水平。因此,根据上述分析,提出以下假说。

H3:就地城镇化能够通过增加财政支出,提升外商投资水平。

2 实证研究设计

2.1 计量模型构建

为检验就地城镇化对地区外商投资水平的影响,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text{invest}_{it} = \alpha_i + \gamma_t + \beta_j \sum \text{control}_{it} + \mu_{it} \quad (1)$$

式中: i 为各省份; t 为年份; α_i 为个体效应; γ_t 为时间效应; $\beta_j (j=1,2,\dots,8)$ 为回归系数,即各变量对外商投资水平影响的弹性系数; control_{it} 为各控制变量; μ_{it} 为随机扰动项。

2.2 变量选取

2.2.1 就地城镇化指标构建

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根据科学性、可操作性和代表性原则从人口结构、经济发展、生态环境、公共服务和城乡统筹等5方面,选取共14个指标综合反映地区就地城镇化发展情况。人口结构方面,城镇化率和城镇登记失业率反映地区城镇化建设成果、就业市场发展程度和人口素质,非农就业率反映就地城镇化建设对人口流动性的影响;经济发展方面,人均GDP和第二、三产业产值占GDP的比例衡量地区产业结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代表地区收入情况;生态环境方面,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和污水处理能力反映地区生态建设情况;公共服务方面,医疗机构数量、教育经费金额和人均道路面积反映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情况;城乡统筹方面,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消费支出比反映城乡协调发展情况。受指标的多样性影响,不同指标对就地城镇化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差异性。“+”表示正向指标,“-”表示负向指标,正向指标表示该项指标数值越大对总体的影响结果越好,反之亦然。

就地城镇化评价指标数据来源于2013—2021年的各省及全国统计年鉴、中经网统计数据库、EPS(express professional superior)数据平台和地方政府工作报告,详细指标选取如表1所示。

表1 全国就地城镇化建设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	单位	预计方向
就地城镇化建设水平指标体系	人口结构	城镇化率	%	+
		城镇登记失业率	%	-
		非农就业率	%	+
	经济发展	人均GDP	元/人	-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人	+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人	-
		第二、三产业产值占GDP比例	%	+
	生态环境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	+
		污水处理能力	%	+
	公共服务	医疗机构	个	+
		教育经费	万元	+
	城乡统筹	人均道路面积	m ² /人	-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	1	+
		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比	1	+

借鉴龙雨^[12]的做法,将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再通过熵值法计算各指标权重,利用式(2)计算就地城镇化水平:

$$V_{it} = \sum_{r=1}^n W_r Y_{itr} \quad (2)$$

式中: W_r 为各指标权重; Y_{itr} 为第*i*个地区第*t*年评价指标数值; m 为评价年份; n 为指标数。

2.2.2 地区外商投资水平

由于各省份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的含义存在差异,为了方便指标统一和数据获取,参考徐丹和于渤^[13]的做法采用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衡量外商投资水平,并利用当期美元兑换人民币的汇率统一单位。

2.2.3 控制变量

为了使回归结果更准确,减少遗漏变量导致的估计结果偏差,参考文献[14]~文献[16]加入相应的控制变量。具体的控制变量如下:基础设施建设(infra),采用年末地区单位面积内公路里程数衡量基础设施建设情况;对外开放程度(open),采用每年地区进出口贸易总额与GDP的比值衡量;人力资本(edu),采用地区每年每万人人口中高等教育本科在校学生数衡量;信息化水平(info),采用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与年末总人口的比值衡量;环境污染水平(envir),采用企业所在地区年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衡量;市场规模(market),采用每年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衡量;科技发展水平(tech),采用各个省份每年的技术市场成交额衡量。

2.3 数据的来源与处理

选取2013—2021年30个省份(因数据缺失,未包含西藏地区和港澳台地区)的数据,主要来源于

中国各省及全国统计年鉴、中经网统计数据库、EPS数据平台和地方政府工作报告。

3 实证结果分析

3.1 基准回归结果

本文探讨了就地城镇化对地区外资投资水平的影响,结果如表2列(1)所示。就地城镇化对地区外资投资水平的回归系数为2.477,并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了就地城镇化会显著地促进地区外商投资水平的提高。在就地城镇化过程中,地方政府为了吸引更多的外商投资,往往会出台一系列招商引资政策,如税收优惠、土地优惠、融资支持等,为外商投资企业提供了更加优惠的经营环境。此外,就地城镇化会推动农村地区基础设施的改善和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基础设施的改善降低了外商投资企业的运营成本,提高了其运营效率;产业结构升级使得外商投资企业在当地找到合适的上下游企业,形成产业链条的完整闭合,提高整个产业的竞争力。

3.2 稳健性检验

指标选择和样本选择是影响模型估计结果的重要因素。为了检验模型的稳健性和结果的可靠性,文章采取缩尾、替换变量和内生性检验等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2列(2)~列(4)所示。

变量缩尾。在分析前文测算的就地城镇化水平和外商投资水平时发现,核心变量存在一些极端

值,这会使得回归结果产生偏差。为了避免极端值对回归结果产生的偏差性影响以及进一步验证结论的稳健性,对所有变量进行1%分位上双边缩尾处理。表2列(2)显示,将变量缩尾后就地城镇化的系数不变,系数符号及显著性均与基准回归一致。这说明核心变量极端值对回归系数的大小影响较小,基准回归的结果具有稳健性。

被解释变量替换为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强度。将被解释变量替换为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强度,表2列(3)显示就地城镇化系数为3.045,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由上述模型得到的结论是稳健的。

内生性检验。由于就地城镇化指标采用多个指标构建,加之使用静态面板数据,难以排除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和遗漏变量所产生的内生性问题。通过使用工具变量法进行内生性检验,将滞后一阶的urban作为工具变量,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回归,结果汇报至表2列(4)。结果显示就地城镇化的系数为3.697,并在10%水平上显著,与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一致,说明基准回归结果是具有说服力的。

3.3 异质性分析

就地城镇化建设对外商投资水平的影响可能因地而异,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地理位置等因素都会影响就地城镇化建设吸引外资的能力。因此,从以下两个角度考虑就地城镇化建设的异质性效果。

3.3.1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异质性

就地城镇化建设的吸引外商投资能力是否随着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而变化。一般而言,地理位置的差异会影响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比内陆地区,东部和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因此,将选取的30个省份划分为东、中、西三部分和沿海与内陆两部分,进行分组回归,结果如表3列(1)~列(5)所示。就地城镇化建设能够显著地提高西部、非沿海地区的外商投资水平,其回归系数分别为5.404和2.907,分别在1%和10%的水平上

表2 基准回归及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1) 基准回归	(2) 缩尾	(3) 替换外商直接 投资水平	(4) 内生性检验
urban	2.477** (0.026)	2.818*** (0.008)	3.045*** (0.004)	3.697* (0.055)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观测值	270	270	270	240
R ²	0.236	0.218	0.399	0.884

注: *、**、***分别表示10%、5%、1%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表3 地区经济水平和政府财政压力异质性分析

变量	(1) 东部	(2) 中部	(3) 西部	(4) 沿海	(5) 非沿海	(6) 财政压力小	(7) 财政压力大
urban	-1.149 (0.451)	-3.262 (0.382)	5.404*** (0.005)	-0.283 (0.848)	2.907* (0.052)	-4.033 (0.728)	4.475** (0.011)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观测值	99	72	99	99	171	135	135
R ²	0.597	0.494	0.546	0.609	0.451	0.257	0.284

注: *、**、***分别表示10%、5%、1%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显著。与此同时,就地城镇化建设会抑制东部、中部和沿海等经济发达地区的外商投资水平。原因可能在于,诸如西部和非沿海地区等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其农村人口较多,具备就地城镇化建设的人口基础,就地城镇化建设效果会更加显著。加之政府对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的吸引外资优惠政策更多,进而显著地提升了外商投资水平。相比之下,东部、中部和沿海地区等经济发展水平较好的地区发展速度较快,人口红利减少、劳动力、土地等成本增加提高了外资企业的经营成本,进而缩小了外资企业的盈利空间,导致外资流出。

3.3.2 财政压力异质性

就地城镇化建设的吸引外资能力是否会随着政府财政压力的变化而变化。一般而言,地区的政策支持力度会影响吸引外资的能力,而政府财政压力的大小会影响吸引外资政策的扶持力度。因此,用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与支出的比值衡量财政压力,以财政压力的中位数为分组依据,若财政压力大于中位数,则判断为财政压力,反之为财政压力小,回归结果如表3列(6)和列(7)。就地城镇化建设对财政压力大地地区的外商投资水平的回归系数为4.475,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对财政压力小地区的回归系数为-4.033,且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了就地城镇化建设会显著地提升财政压力大地地区的外商投资水平,抑制财政压力小地区的外商投资水平。可能原因在于,财政压力主要来源于政府收入与支出责任的不匹配,地方政府能够通过引进外资、优化资源配置、转移支付等多种措施缓解财政压力。财政压力大的地方,政府在落实就地城镇化政策时更注重提高该地对外资的吸引力,以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

3.4 机制检验

在前文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对作用机制进行检验,考察就地城镇化建设是否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优化营商环境以及增加财政支出等方面影响外商投资。

为了验证前文的假设,借鉴王俊豪等^[17]的做法,采用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例来衡量产业结构的发展水平,借鉴杨仁发和魏琴琴^[18]的做法,利用熵值法测算出营商环境的指标权重以及借鉴孔凡斌等^[19]的,采用政府财政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来衡量地区财政支出规模,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就地城镇化建设对地区产业结构、营商环

表4 机制检验

变量	(1)	(2)	(3)
	产业结构	营商环境	财政支出
urban	0.620*** (8.74)	0.552*** (3.19)	0.324*** (4.44)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观测值	270	270	270
R ²	0.647	0.549	0.747

注: *、**、***分别表示10%、5%、1%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境以及财政支出规模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620、0.552、0.324,且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了就地城镇化建设能够显著地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优化营商环境以及增加政府的财政支出。这意味着,就地城镇化建设能够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优化营商环境以及增加政府的财政支出,进而提升地区外商投资水平,H1~H3得以证实。

4 结论和建议

就地城镇化建设是实现新时期城乡一体化的重要路径^[20],也是促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吸引更多外资的重要手段。本文基于2013—2021年30个省份面板数据,实证回归了就地城镇化建设对地区外商投资水平的影响,得到以下结论。

(1)基准回归结果表明,就地城镇化能够显著地促进外商投资水平,并通过了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

(2)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就地城镇化建设能够提升西部、非沿海地区等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的外商投资水平,抑制东部、中部和沿海地区等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的外商投资水平。此外,政府财政压力异质性结果显示,就地城镇化建设能够显著得提升政府财政压力大地地区的外商投资水平,抑制财政压力小地区的外商投资水平。

(3)机制检验表明,就地城镇化建设能够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优化营商环境以及增加财政支出3个方面,进而促进地区外商投资水平的提升。根据上述结果,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首先,加快落后地区的就地城镇化建设对经济的引领作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异质性表明,就地城镇化建设能够显著地促进西部、非沿海等经济发展水平低地区的外商投资水平。因此,经济落后地区可以通过加快就地城镇化建设,提高吸引外资能力,进而促进落地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实现经济的协同发展。一方面,全面落实取消县城落户限制

政策,确保稳定就业生活的外来人口与本地农业转移人口落户一视同仁,确保新落户人口与县城居民享有同等公共服务,保障农民工等非户籍常住人口均等享有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进而经济发展水平低地区的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实现就地城镇化建设。另一方面,要依法保障进城落户农民的农村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支持其依法自愿有偿转让上述权益。

其次,加快完善政绩考核机制对财政压力的监督作用。财政压力异质性表明,就地城镇化建设地方政府能够通过引进外资缓解财政压力,进而提升地区的外商投资水平。然而,有些地方为了完成政绩,会盲目地吸引低质量外资,抑制地区经济的发展。因此,要加快完善政绩考核机制对财政压力的监督,充分发挥财政压力对吸引外商投资的积极推动作用。一方面,建立科学合理的评估指标体系。坚持从实际出发,绩效指标不仅要充分考虑到人民生活质量、生活水平和满意度等群众需求,还要体现不同层次、地区、部门的差异和特点,做到科学合理、真实管用。另一方面,加强制度建设。健全政府绩效管理总体规划,形成具有操作性的措施办法,对地方政府绩效管理进行有效指导和约束;打破内部评估格局,扩大群众参与,加强第三方评估机构建设;引导各级政府积极创新管理方法,坚持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并重。

最后,加快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对营商环境的改善作用。理论机制分析表明,就地城镇化建设能够通过优化营商环境,显著地提升地区外商投资水平。因此,实现就地城镇化建设对外商投资的促进作用,需要加快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对营商环境的改善作用。一方面,地方政府和企业要“亲”。地方政府对企业要“亲”,要坦荡真诚同企业接触交往,特别是在就地城镇化建设中,各企业遇到困难和问题情况下更要积极作为、靠前服务。企业对地方政府要“亲”,企业积极主动同各级党委和政府及部门多沟通,讲真话、说实情、建诤言,积极支持就地城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和企业要“清”,地方政府对企业要“清”,要坚持两袖清风,不搞权钱交易。企业对地方政府要“清”,要洁身自好、做到遵纪守法、规范经营。通过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政商携手加快地区营商环境的改善,为外资企业建设一个公平、公正的良好营商环境。

参考文献

- [1] 徐文舸,赵惠.“十四五”时期新型城镇化拓展投资空间的趋势和潜力[J]. 宏观经济管理, 2021(6): 10-17.
- [2] 孙孟. 新形势下新型城镇化建设投融资探讨[J]. 宏观经济研究, 2023(9): 68-74.
- [3] 李江涛,王学凯. 城镇化水平对投资率的影响研究[J].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49(5): 1-15.
- [4] 刘立峰,冯梦缘. 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持续释放消费和投资潜力[J]. 中国经贸导刊, 2024(2): 52-55.
- [5] 阚大学,吕连菊. 城镇化对外商直接投资影响的实证研究[J]. 经济经纬, 2018, 35(2): 64-70.
- [6] 胡凡. 中国新型城镇化进程对 FDI 流入的影响研究——基于 31 个省市的面板数据[J]. 湖南社会科学, 2016(2): 141-144.
- [7] 林俊岐,朱万闯. 中国城市化对外商直接投资影响的实证检验[J]. 统计与决策, 2011(23): 111-114.
- [8] 潘雅茹,罗良文. 区域城镇化差异对 FDI 空间集聚的影响——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 GMM 估计[J]. 华东经济管理, 2015, 29(2): 55-60.
- [9] 王俊生,焦华富. 安徽省县域就地城镇化时空演化与影响因素[J]. 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 2024, 40(4): 109-115.
- [10] 李爽. 新型城镇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J]. 价值工程, 2024, 43(20): 147-149.
- [11] 胡渊,杨勇. 财政支出、投资环境与 FDI 地区分布[J]. 宏观经济研究, 2021(9): 73-85.
- [12] 龙雨,李月星,唐菁菁,肖峰. 区域就地城镇化动力因素分析——以长株潭为例[J]. 经济研究导刊, 2016(21): 65-67.
- [13] 徐丹,于渤. 高技术产业集聚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基于长三角城市群的实证考察[J]. 软科学, 2021, 35(10): 1-8.
- [14] 齐文浩,王利国,王云霞. 社会资本调节下创业绩效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J]. 山东社会科学, 2022(11): 152-161.
- [15] 李荣杰,李娜,陈健强,等. 政府-市场协同创新与能源结构双重替代[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22, 39(23): 33-43.
- [16] 于扬,夏德峰. 智慧城市建设对营商环境的影响研究[J]. 经济经纬, 2022, 39(1): 24-35.
- [17] 王俊豪,谢倩莹,史丹. 绿色技术创新对能源效率的影响研究[J]. 财贸经济, 2024(7): 36-43.
- [18] 杨仁发,魏琴琴. 营商环境对城市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基于中介效应的实证检验[J]. 调研世界, 2021(10): 35-43.
- [19] 孔凡斌,蒋定宏,徐彩瑶. 经济发达地区农业生态效率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以浙江省为例[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2024, 29(9): 307-322.
- [20] 王琴,伍达富,母欢欢. 贵州省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发展研究[J]. 科技和产业, 2024, 24(9): 195-200.

Local Urbanization and the Level of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Region

WU Mengya¹, GUO Xu², GUAN Dengjia²

(1. Department of Digital Finance and Business, Wuhu Aviation Vocational College, Wuhu 24100, Anhui, China;

2. School of Shipping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Dalian Maritime University, Dalian 16000, Liaoning, China)

Abstract: Attracting and utilizing foreign investment at the county level is an important practical requirement for promoting China's high-level opening up. In terms of theoretical research, the mechanism of the improvement of foreign investment in local urbanization construction was expounded from three aspects such as industrial structure, business environment and fiscal expenditure. In the empirical study, taking the panel data of 30 provinces (due to the lack of data, the statistical data mentioned here do not include the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the Macao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and Taiwan Province) from 2013 to 2021 as samples, the local urbanization index was constructed by entropy method. The empirical test results show that local urbanization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level of regional foreign investment. Compared with areas with high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and low fiscal pressure, local urbanization has a more signific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level of foreign investment in areas with low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and high fiscal pressure.

Keywords: *in-situ* urbanization; the actual use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entropy method